



专家说

●黎旭 1967年生于广东电白,毕业于暨南大学。古砖金石文化学者,湖北省博物馆特约研究员,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,《中国古砖全集》主编



千年广州,文脉绵延不断。一砖一瓦,皆有历史留存。

早在1700多年前,“广州”二字,已深深地镌刻在历尽沧桑、粗粝朴实的古砖上。

砖,本字为“甃”,也有“甓”、“壁”等古名,看似其貌不扬,随处可见。然而一块来自古代的铭文砖,在金石学者、古砖藏家眼里,绝非普通的砖头,而是一件可“证经补史”、向历史问道的敲门砖。

自东汉至民国,广州地区在不同朝代都

有古砖存世,古砖上的文字和图像,为人们认识古代广州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。

广州地区的存世古砖有何历史价值?各个朝代的砖铭有何特色?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《中国砖铭全集》,系统辑录了从战国到民国近7000种中国古代砖铭,其中广州地区的有数十种之多,不乏富有岭南特色的珍品。该书主编黎旭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古砖蕴藏的丰富历史人文信息。

瓦甓无言犹有道 千年文脉可绵延

羊城晚报记者
施沛霖 徐炜伦



古砖能“证经补史”(黎旭藏品) 施沛霖 摄

壹
古砖价值:文化载体与实物史料

作为建筑材料,历朝历代皆用砖。秦汉以来几乎每个历史年代的古砖都有实物存世,而且砖铭内容丰富,书法风格齐全,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。

古砖金石文化学者黎旭认为,铭文砖作为古代文字的载体,其学术功能并不逊色于甲骨、青铜器、石刻、简牍、法帖、书法等传统主流器物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古砖很早就被金石学家发现和研究,古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?

黎旭:中国是世界上建筑用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古砖是建筑材料,也是文化载体。

此处讲的古砖,是指砖体表面附着有文字、图案的古砖,最早出现在战国早期。它是传统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,其地位不逊于青铜器、石刻、甲骨文、古陶文。

古砖的特点是量大,历史跨度长,覆盖面广,基本上从汉以后,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古砖存世。

古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学术和历史的研究价值上。

古代
文
砖
是
实
物
的
史
料
(黎旭藏品)
施沛霖 摄



砖
自
唐代起已深
受文人喜爱
(黎旭藏品)
施沛霖 摄

它是实物的史料,砖铭的内容分成记名、标记、纪年、记事、颂祷语、墓志、地券(契约会葬品)、随笔八种,文字书法的形态也多种多样,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。

通过研究古砖,我们很容易发现存世史料、书籍上看不到的信息。因为砖上的文字和画像多是古代社会中下层民众的作品,它所记载的内容,往往是中国的官方历史典籍中所缺少的,故古砖具有“证经补史”的作用,是庙堂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。

在清朝的乾隆、嘉庆时期之后,中国的金石学复兴,研究古砖的学者渐多,古砖作为传统中国的一个载体,其意义也越来越丰富。到了清末,已经出现不少研究古砖及著录古砖拓片的专著。

清末民国时期,对古砖研究卓有成就的大家有陈介祺、陆心源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鲁迅等。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藏品质精量富,青铜彝器、权量诏版、玺印、封泥、陶文、镜鉴、刻石、砖瓦、古币、泉范、碑帖、书画等无所不包,他精于鉴赏,尤擅墨拓技艺,享誉海内外的毛公鼎曾是他的旧藏。陈介祺藏砖文拓本现藏国家图书馆,以汉、晋时期为主,砖文或为年号,或为地名,或为吉语颂祷之词,文字砖体方圆兼备,皆为珍品。

同时,古砖也极具收藏价值。古砖的收藏风气自唐朝已兴起,唐朝人素喜将汉晋古砖雕刻成砚台,并视为风雅之事。

我国金石学滥觞于北宋,南宋郑樵著《通志》,以金石别立一门,列于二十略中,金石学自此成为专门学科。古砖作为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,在宋朝就受到了重视。乾隆嘉庆年间,古砖收藏十分蓬勃。清名臣、金石学家阮元喜收古砖,书斋名为“八砖吟馆”,他将砖文拓下来寄赠好友,集诗题跋。到了清末民国,藏砖风雅尤甚。吴昌硕为其中佼佼者,不但收藏古砖、砖砚,其书法篆刻更从古砖取法,并将其拓印后题跋、补画等,极有文人意趣。

广州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,“广州”二字不但出现在历史典籍中,也深深地镌刻在久经沧桑的古砖上。

早在秦代,“番禺”成为秦南海郡的郡治,是广州最早的地名。吴黄武五年(226年),孙权以岭南疆域的合浦为界,将交州(辖域相当于今天广东、广西及越南北部)分为交州与广州两部分。大概以合浦以北以东区域划归广州,合浦以西以南区域划归交州。广州治仍在番禺(即今之广州城),广州之名由此而来。

比起江南、中原地区,广州地区存世的古砖数量并不算多,主要集中在东汉、西晋、南汉、宋、明、清及民国时期。广州地区存世的东汉古砖,砖铭中刻有“番禺”二字;西晋永嘉年间的古砖铭上已出现“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”等字样,有学者认为这是广州地区出土的古砖中首次出现“广州”字样,是1700多年前广州风貌的实物佐证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广州地区的存世古砖主要集中在哪里?有什么特色?

黎旭:广州地区的存世古砖集中在东汉中后期、西晋后期、南汉、宋、明、清及民国时期。

东汉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,是在番禺发掘出土的一批古砖。如“成熟”古砖、“番禺都亭长陈诵”古砖等,都极具代表性。

还有一些模印砖,如“长乐富贵”砖,这一砖铭是隶书的变种,十分成熟,书法艺术非常高。

其中一品相当有意思的乘法口诀砖,从“三九二十七”到“五九四十五”,都刻在砖的大面上。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在广东地区,各方面的文化都是比较成熟的,与中原等中央地区一脉相承。

建国后,在广州地区发掘出一批晋宋永嘉年间的模印文字砖,比如模印有“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”“广州法不祥乐未央”等吉语的古砖,这些砖铭极有地方特色。西晋永嘉五年(311年)的永嘉之乱,中国北方陷入战乱,经济残破,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处于“平且康”的社会局面,诗般的砖铭记录了广州这一段和平盛世。

值得一提的,还有五代十国的南汉时期的广州古砖。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刘隐、刘岩兄弟建立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,刘岩称帝后又改称广州为兴王府。这一时期发现的古砖铭大概有十多二十种,如“大汉白龙乙酉”,这个砖铭是典型的草书,草法精妙,它是湿刻上去的。

模印砖方面,砖铭为“白龙元年三月十四日故靖海将军陈公之墓”的古砖便很具特色,这是一个墓砖。还有“大有元年九月朔”砖,是属于城墙砖。

在广州地区存世的宋代古砖里,比较富特色的有两种,第一种是以诗歌随笔为内容的刻画砖,第二种是城墙砖。民国时候拆广州城墙时,曾拆出了一批古砖,另外解放后在广州北京路附近也出土了一些广州的宋代城墙砖,存世的宋砖以这两批为代表。

以诗文为内容的宋砖砖铭令人印象深刻。有一品广州城墙砖,为博物学者、顺德名士蔡守旧藏的,上刻七言诗曰:“似从工作到如今/日挑柴吃苦辛/一日秤米要五百/两朝定是共千斤/山高路远难得步/水深泥滑阻工程/传语诸公除减少/莫教思苦众军人。”这些诗文显浅易懂,颇具民间特色,反映了宋代劳苦大众和守城军人的艰辛生活。

在广州地区比较有特点的明代古砖,是近年在广州金沙洲出土的明末陈天游的墓砖。陈天游为明弘治十八年进士,官至应天府尹,其家族“一门七进士”。

及至清朝,广州地区古砖存世数量较多,有城墙砖、官邸里的砖、书院里的砖、墓砖等,文字和图案繁多,较有特色的是类似宋朝的诗文砖,艺术水平很高,如“宋之登高王台五言诗”砖,行草写得非常好。这种砖还有一个好处:它留下了那个时代诗文的另一种版本,可以对照典籍,互为参考。

羊城晚报记者:在近现代,学者对广州地区的古砖研究和收藏的情况如何?

黎旭:广州地区的古砖研究和收藏从清代乾隆、嘉庆时期起就很蓬勃,特别是清末民国及现当代,有很多前辈学者作出了贡献。

值得一提的是顺德名士蔡



走入黎旭位于广州小洲村的大自在山房,顿时觉得身心安静下来,这里架子上、案头上都层层叠叠地摆放了不同年代、不同铭文的古砖,透出岁月沧桑感。

从1993年收藏第一块古砖起,近30年间,黎旭的藏品已达数千种之多,出土地区涵盖中原、西北、江南、华南、西南巴蜀等地,他曾向海南博物馆捐赠300件古砖,向湖北博物馆捐赠100多件古砖,并向中山大学捐赠一批古砖拓片等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国内只有二三十位古砖藏家,到如今藏砖、爱砖人士遍布大江南北,砖瓦和砖铭拓片的热度也越来越高,黎旭见证了近年古砖收藏市场的变化。

羊城晚报记者:近年古砖收藏的热度如何?哪类古砖藏品较受欢迎?

黎旭:当代的古砖收藏,除了学术研究意义以外,还有着现实的经济意义。古砖收藏一般分两部分,一是原砖收藏,这是较为常见的。另一种是把古砖改制成文房用品,如砚台、镇纸、笔筒,也很受藏家欢迎。

在拍卖市场上,这类藏品价格非常高,如民国时候的一些名人收藏过的砖瓦,动辄都是几百万元成交。当代的古砖,由金石文化大家亲手改制的砚台,也是当下收藏的热点,很受文人追捧,收藏价值也非常高。



守及其如夫人、被苏曼殊赞为“画人印人一身兼、挥毫挥铁俱清严”的谈月色。在民国期间,广州拆城墙时拆出的许多古砖,其中大部分被蔡守夫妇保存下来,他们还共同主持东郊猫儿岗汉墓发掘。因为他们收藏,使这些古砖及拓片得以保存,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历史原貌。

另一位大家是黄文宽先生,他以法律为业,又广泛涉猎考古、碑版、史学、书法、篆刻等,为岭南金石大家。从民国开始到建国后,他在古文字考据、古砖研究方面颇多建树,起承上启下之功。

王贵忱先生是版本目录学家、文史学家、书法家、金石学家和钱币学家,他对广东地区古砖的收藏保护也作出了很大贡献,他收藏的南越王国文字陶瓦,全部捐给了广东省博物馆。

藏家说

“言必有本,无征不信”

“贫”字瓦范表明:
广州东山曾存在南越瓦窑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/受访者提供

●受访嘉宾:王大文

著名文史学家王贵忱之子及学术助理,编辑整理《南越国陶瓦墨影》《可居室藏钱币文献图录》《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》等

5月的一个午后,羊城晚报记者来到著名古文献版本学家、古钱币学家、金石学家、历史学家王贵忱家中。

在这所位于广州五羊新城的幽静书斋里,王贵忱的长子王大文向记者展示了一套散发着墨香

的《南越国陶瓦墨影》。此书是在王贵忱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的363片南越国残瓦中,选取了171片残瓦,由王贵忱祖孙三代费时一年多编拓而成的。在这批文字残瓦中,“万岁”瓦当、“口贫”字瓦范皆是有代表性的岭南文物。

王贵忱在书中题跋:“岭南文脉,源渊有自。不佞辽东策马南来,忽近七十春秋。叹岭南文化博大精深,爱之,学之,传之,今亦粤人矣。”王贵忱以传承岭南文化的行动来回馈了岭南对他的培育。

广州是岭南文明的发源地。秦末汉初,赵佗建立南越国,定都番禺(今广州)。据史书记载,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将中原先进生产技术、先进文化和社会模式引入岭南,南越陶便是这个历史进程的见证物。

王大文向记者回顾了这批南越国文字残瓦的发掘、保存及捐献始末: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广州修建广九铁路,在东山龟岗出土了一批文字陶瓦,岭南学者潘六如以其实体有篆隶递变特征,考为南越王宫遗物。这是岭南首次发现南越国文物,使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南越国之说得实物佐证。潘六如将研究成果整理为《潘六如南越瓦文稿》,其中《拾瓦行》诗真实记录了在广州东山地区发现南越残瓦的过程:“……土中有奇物,绳文如错纵。隐隐有虫书,刻画争玲珑。视之为瓦文,考据无适从。种类不一致,彼此非雷同……”

其后,岭南学者汪兆镛、潘龢、蔡守、谈月色、谢英伯、李尹桑、陈大年、邓尔雅、黄慈博、黄少梅、罗原觉、关寸草、冯霜青、曾传韶、黄文宽相继参与对南越残瓦的发掘、研究。

1949年王贵忱随军南下,寓居岭南。从温丹铭、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

周